

霍妮的社会文化神经症理论及其历史地位

郭永玉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系

一、理论形成

凯伦·霍妮(Karen Horney, 1885—1952)是一位杰出的女心理学家和精神医学家。她以非凡的勇气和深邃的洞察力,创立了一种新的神经症理论,领导了新的精神分析运动,成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领袖人物。但霍妮的理论在中国心理学界和精神医学界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全面述评霍妮的理论对于精神医学的理论建设和心理治疗实践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意义。

霍妮毕业于柏林大学医学院,191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并接受了四年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她的理论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继承、批判和发展。除了弗洛伊德,影响她的理论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 治疗实践。霍妮的理论首先是在治疗实践中形成的,她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不能适应新的临床实践,因为她移居美国时,正赶上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失业、房租、食品、医药费等等,性的问题是次要的。这使她认识到,心理问题的根源在社会环境,而不在生物本能。2. 其它精神分析学家的影响。从时间上讲,阿德勒(A. Adler)背离弗洛伊德而强调环境因素比霍妮要早,自然受到霍妮的关注,但霍妮又多次批评阿德勒的理论太理性化和简单化。霍妮接受影响较多的是弗罗姆(E. Fromm)、沙利文(H. S. Sullivan)、卡丁纳(A. Kardiner)等人。3. 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成果。霍妮指出,在弗洛伊德的时代,还缺乏有关文化与人格的关系的知识。霍妮则从米德(M. Mead),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启发,看到与文化多样性相对应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

霍妮的主要著作有:《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1937)、《精神分析的新道路》(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以及由其弟子整理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

二、文化、人格、神经症

霍妮的研究是围绕神经症(neurosis)的病理学而展开的。霍妮把神经症分为情境神经症(situation neuroses)和性格神经症(character neuroses)。前者仅仅是病人对特定的困难情境(如考场)暂时缺乏适应能力,但未表现出病态的人格;后者则是由性格的变态引起的,就是说患者具有某种神经症的性格结构。霍妮关注的是后者,因此她常常将性格神经症简称为神经症。神经症的病因在于人格结构,而人格结构则是由个人的生活环境决定的。如果不了解文化环境和个人生活环境,就不能了解他的人格;而不了解他的人格,就不能诊断和治疗他的神经症。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确定神经症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则取决于社会文化为其成员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不同文化、时代、阶层、性别的成员,社会为其规定的行为模式是不同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因别人提到他已故亲属的名字而大为恼怒,我们一定会认为他是神经病;但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ila Apache)文化中,这种人却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1]整日游手好闲,只在出猎和征战中一显身手,对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阶级而言是正常的;但对资产阶级而言则是不正常的。神经症只不过是偏离了社会文化所规定的正常的行为模式。

神经症的根源要从社会文化中去寻找。“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典型因

境,这些困境作为种种内心冲突反映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日积月累,就可能导致神经症形成。”^[1]导致神经症患者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是现存文化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竞争、成功与友爱、谦卑的矛盾。文化对个人提出的这两方面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第二个矛盾是人们不断被激起的享受需要与人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时实际受到的挫折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所谓的个人自由与实际受到的各种限制之间的矛盾。这些社会文化困境使人们陷入难以调和的内心冲突之中。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要面对这些困境并产生内心冲突,正常人与神经症病人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神经症病人由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特别是童年经历)等原因,过分强烈地体验到这些困境和冲突。神经症是时代和文化的副产物。

三、基本焦虑

社会文化的矛盾所造成的人际关系困难是神经症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我将环境及其困难置于问题的中心。但在全部环境因素中,涉及性格形成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一个孩子成长于其中的人际关系。”神经症“最终是由人际关系的障碍决定的”^[2]。这种障碍往往首先存在于神经症病人童年的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亲子关系之间。儿童必须得到成人的帮助才能满足需要,如果父母不能给予儿童真正的爱,就会造成儿童的不安全感。霍妮将这类父母行为称为“基本罪恶”(basic evil)^[3]。一个儿童的父母如果经常表现出这类行为,就会使儿童产生敌意,霍妮称这种敌意为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这样,儿童就陷入一种既依赖父母又敌视父母的不幸处境之中。由于无能无助之感,由于害怕,由于敌意所导致的内疚之感等等,使他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基本敌意很容易泛化到整个世界和一切人,使人感到世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潜伏着危险。基本敌意及其压抑使人陷入焦虑,霍妮称之为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这是一种在内心不知不觉地积累并到处蔓延渗透

的孤独和无能之感,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依无助、被抛弃、受威胁的体验,一种置身于一个充满欺诈、妒嫉、怨恨、背叛和荒诞的世界中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一块随时有可能滋生神经症的肥沃土壤。

四、神经质需要

敌意和焦虑导致更深的的不安全感和更深的痛苦,为了减轻基本焦虑,就会形成一些防御性策略。这些策略是一些无意识的驱动力量,霍妮称之为神经质需要(neurotic needs)。她在《自我分析》一书中,列举了10种常见的神经质需要:1. 对友爱和赞许的神经质需要。2. 对主宰其生活的伙伴的神经质需要。3. 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神经质需要。4. 对权力的神经质需要。5. 对利用他人、剥削他人的神经质需要。6. 对社会承认和声望的神经质需要。7. 对个人崇拜的神经质需要。8. 对个人成就和野心的神经质需要。9. 对自足和自立的神经质需要。10. 对完美无缺的神经质需要^[4]。上述需要的内容本身并非神经质的,正常人也需要友爱、赞许、伙伴、回避、节俭、权力、声望、成就、完美等等,但神经症的需要盲目地偏执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强迫地、无意识地、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满足,而不能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而主动地选择适当的目标。

五、神经症人格

霍妮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人格的动力学观点,需要决定人格,而神经症的需要决定了神经症病人的人格。神经症人格的类型主要有三种:1. 顺从型(compliant type),其行为方式是接近人(moving toward people)的。这种人对友爱、赞许、伙伴或者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在狭窄范围内怀有神经症的需要。主要特征:甘居从属地位,常有一种“我多渺小可怜”之感;总认为别人比自己强;无意识地倾向于以别人的看法来评价自己。他的安全感建立在这种逻辑上:如果我顺从了,那我就不会受到伤害。2. 敌对型(hostile type),其行为方式是对抗人(moving against people)的。这类人

对权力、剥削、声望、个人崇拜、成就、野心等怀着神经症的需要。主要特征:将生活视为一场搏斗,适者生存,必须控制别人以掌握主动权;一心想超群出众、事事成功以至功名显赫;千方百计利用他人给自己带来好处;好斗但输不起;努力工作但并不真爱工作;压抑感情,不愿为感情而“浪费时间”;彬彬有礼的外表隐藏着老谋深算的狠毒。他的安全感建立在这种逻辑上:如果我有权力,那就没有人能伤害我。3. 退缩型(detached type),其行为方式是回避人(moving away from people)的。这类人对自足自立、完美无缺怀着神经症的需要。主要特征:为逃避与他人的紧张关系而离群索居;保持与他人的距离,不以任何方式与他人发生感情上的联系,好比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魔圈,任何人不得侵入;不介入;自立自强;限制自己的需要;凡事力求完善,以避免他人的帮助或指责。他的安全感建立在这种逻辑上:如果我离群索居,什么也不能伤害我。

在正常人身上,这三种行为方式可以根据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他既能顺从,又能反抗,也能回避,三者相互补充。但神经症病人缺乏变通的能力,他仅仅运用其中一种来应付一切生活难题。结果不仅不能克服焦虑,反而陷入更深的焦虑。

六、神经症自我

霍妮把人格看成是完整动态的自我(self),这种自我可区分为三种基本存在形态:1. 真实自我(real self),指个体的潜能。人的一切能力、成就等等,都是从真实自我发展而来的。它是发展的源头,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力量,具有建设性。只要身体机能正常,环境适当,就可能发展成健全的人格。因此霍妮将真实自我称为可能的自我。2. 理想化自我(idealized self),指个体凭空在头脑中设想的形象,是不可能实现的纯粹虚幻的形象。因此又称为不可能的自我。3. 现实自我(actual self),指个体此时此地身心存在的总和。霍妮通过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揭示

了神经症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她研究神经症人格的三种类型时着重分析了神经症病人与他人关系的失调,那么她研究自我是为了着重分析神经症病人与自我关系的失调。正常人也有理想,但这种理想与真实自我、现实自我之间是一致的。这种理想符合实际又具有动力性,有助于人的自我实现。但神经症病人的理想化自我与其真实自我、现实自我之间是冲突的,他脱离了真实自我所提供的可能性,以一种幻想的完美形象去贬斥、憎恶现实自我。当一个人被理想化自我控制时,他就被“我应该是什么”所驱使。霍妮称这种现象为“应该的专横”。他总是对自己说:我应该忍受一切,应该喜欢每一个人,应该诚实、慷慨、体谅、公正、勇敢……^[5]。

七、基本冲突

内心冲突是神经症的基本特征。霍妮将神经症病人在基本焦虑基础上所形成的内心冲突称为基本冲突(basic conflict)。综观霍妮的理论,基本冲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各种神经症需要之间的冲突。神经症病人为克服焦虑而强迫性地追求一种或少数几种需要,就压抑了其他的需要。二是对待他人的三种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由于神经症病人强迫性地使用一种方式,需要的追求和行为方式的使用都不是自发的合适的选择,这样,其他的需要或行为方式就可能有自发地发挥作用的倾向,而神经症的需要或人格又与它们互不相容,于是有压抑,压抑则导致冲突。第三种冲突的情形是理想化自我与真实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冲突,其核心是真实自我的建设性力量与理想化自我的阻碍性力量之间的冲突。

为解决自我的冲突,可能形成三种策略:一是自谦(self-effacement),贬低自己、常有失败感、自恨、自卑。二是夸张(expansion),美化自己、有强烈的优越感、自信、好胜。三是放弃(resignation),放弃努力、逃避冲突、习惯于独处。这三种解决自我冲突的策略分别对应于三种对待别人的行为方式:接近人、对抗人、回避人。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霍妮的神经症理论的总体思路:个人在充满矛盾的社会文化和失调的人际关系中生活,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基本焦虑,为解除焦虑而产生神经症的需要,进而形成特定的对待他人的行为方式,并使自我陷入冲突之中;于是,他又去寻找解决冲突的策略,由于神经症病人只会强迫性地使用一种策略,结果又使他陷入新的焦虑和冲突之中。而这种恶性循环又是无意识地进行的。

八、神经症的治疗

霍妮的神经症理论是服务于治疗目的的。从上述霍妮关于神经症的揭示可以看出她对神经症的实质的独特理解。她认为神经症是焦虑、由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策略、由缓和内心冲突的努力等等所造成的心理紊乱,当这种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的共同行为模式,就是所谓神经症。霍妮认为人生来具有实现自己潜能的建设性力量,神经症治疗就在于使病人发现并发展自己的潜能,将其天赋中的建设性力量引向自我实现的轨道。

霍妮虽然也使用弗洛伊德创立的诸如自由联想、梦的分析等技术,但使用这些技术主要不是挖掘与性有关的早期经验。霍妮重视的是早期的亲子关系。尽管如此,霍妮还是反对夸大早期经验的作用。霍妮主张把分析治疗集中于病人的神经质需要和人格结构,以帮助病人克服冲突,实现与他人的和谐关系和与自我的和谐关系。

倡导自我分析是霍妮对精神分析治疗的一大贡献。霍妮在《自我分析》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自我分析的态度、规则、步骤和方法,以缓解社会对分析治疗的广泛需要与专家治疗的局限性(专家少、治疗费用高、费时等)的矛盾。当然,霍妮倡导自我分析并不是要取消专家治疗,而是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

九、简评

霍妮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创者,她以当仁不让的科学态度、勇于创新的精神

和顽强鲜明的个性,开辟了精神分析的新道路,并最先建立起社会文化精神分析的基本框架。她善于吸收人类类、社会学等学科的新成果,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文化条件创建了一种新的神经症病理学,一方面继承弗洛伊德的一些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将着重点从本能与文化的矛盾转移到文化本身的矛盾,强调自我分析,使精神分析治疗更广泛更有效地满足现代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霍妮坚信人生来具有自我实现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乐观主义的信念好比一股清新的空气,驱散了弗洛伊德造成的、而荣格的神秘主义和阿德勒的自卑情结理论又无能为力的悲观氛围。在这个意义上,可将其视为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学的先驱。

但霍妮的分析重点是早期亲子关系失调所导致的对儿童安全感的威胁,这就把丰富复杂、广阔多变的社会生活简单化了。尽管她反对过分重视早期经验,尽管他有较开阔的社会文化视野,还是没能真正克服弗洛伊德的早期经验决定论。其次,作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创立一套完整的社会改革理论固然超出了职业范围,但霍妮一方面指出了现存社会文化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只关心个人如何去适应这种文化,没有提出社会改革的要求。相对于弗洛伊德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态度,霍妮在这一点上是一种倒退。

参考文献

1. 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3,239页。
2. Horney K: 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39; 78
3. Horney K: Our inner conflicts. New York, Norton, 1945; 41
4. Horney K: Self-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42; Chap. 2.
5. Horney K: 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New York, Norton, 1950; 65

(1995年6月收稿)